

郭天锡和他的《云山日记》^①

于 为 刚

元代书画家郭昇的日记手迹，现藏上海图书馆。但上图所藏非日记传世的全部，尚有小部分藏别处。这是我国现存名人日记真迹较早的一部，无论从史料价值或艺术价值上讲，都可以称之为珍品。本文试图就这部日记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郭天锡的身世

郭昇字天锡，一字佑之，号北山，晚年号退思，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人。据近人陈庆年考证，他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卒于顺帝至元元年（公至1280—1325年），年五十六。^②天锡生于元世祖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到他去世时（顺帝至元元年）的五十六年时间里，是元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江南的知识分子对蒙古的统治，由反抗以至于逐渐适应。郭昇和他的父亲正是这一类知识分子。

郭昇的父亲名景星，字元德，号义山，宋咸淳五年以乡试待补贡，太学生。元统一中国后，翰林王构、编修李谦，为了新王朝统治的巩固，奉命使江南时，镇江的地方官曾把景星推荐给他们，但景星以母亲年老为理由，不肯做官。到世祖至元末年，才因燕公楠的荐举，被任命为淮海书院山长，后调湖州长兴州儒

学教授，仁宗皇庆元年调镇江儒学教授，最后以从事郎台州路黄岩州判官致仕。

郭昇工书善画，弱冠即应试宪司，授教官。大德中，仅是镇江府学的学录，仅正九品，官是很小的。武宗至大元年，天锡二十九岁，九月往杭州谋升学正或山长，没有成功。在此前一年，即大德十一年，天锡曾赴大都，当与此次谋升迁有关。迟至至大二年五月始得任饶州鄱江书院山长。仁宗延祐元年天锡三十五岁，参加乡试未第。据俞希鲁在天锡的《快雪斋文集》序上说：“天锡身長八尺余，美须髯，善辩论，通国语，长于书画，有文誉，而试不中选。”

天锡曾出任处州路青田县腊原巡检。按元制，县设巡检司，设巡检一人，仅九品，此恐在被调任儒学教授之前。天锡曾被调充平江路吴江县儒学教授，没有赴任，江浙行省辟为掾史，此事见于至顺四年俞希鲁所纂《镇江府志》。至顺四年即顺帝元统元年，是天锡去世的前二年。天锡宦迹止于江浙行省掾史，在仕途上没有能实现他的抱负，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天锡的才学主要表现在绘画和书法上。缪荃孙在《云山日记》序上说他书仿赵松雪，画师高房山，所以与他交往的人大多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其中有赵子昂。至大元年天锡赴杭时，赵子昂也在杭州。《云山日记》记载：“九月二十四日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二十八日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十月六日见赵子昂不遇，见赵仲美。”从这几段日记上可以看出天锡与赵子昂交往的密切。郝左丞当是郝天挺，元制行中书省最高长官是丞相，下设左右丞，都是正二品，地位很高。天锡与倪云林的交往则在至顺三年，他曾与王伯容慰讯“荆蛮民”于汾湖，倪云林号“荆蛮民”。俞希鲁在《快雪斋集》序上说到天锡在当时书画

家中的地位时说：“吴兴赵公子昂、渔阳鲜于伯机、蓟丘李公仲宾、房山高公彦敬、曹南商公德符皆与相颉颃，碌碌余子，视之若无人。”以上诸人都是当时的名家。除赵孟頫外，关于鲜于枢，在《云山日记》上曾经提到，但未载有往来。缪荃孙谓天锡画师高房山，《快雪斋集》中有题《高尚书秋山暮霭图》诗一首，按高克恭字彦敬，房山人，曾任户部尚书。根据这条资料，天锡与高克恭是可能常有交往的。天锡与吾丘衍相交则另是一番情况，《云山日记》于至大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记云：“访吾子行，出所作《无稽集》，皆戏谈也。”十月初七日记：“访吾子行求篆字，闲话久之，惠印色方”。十九日记：“三桥早饭，饭已，见吾子行，写篆书相送，仍取玉箫为余吹数阙，子行隐居不仕，时能道滑稽语，亦近来罕有。”寓杭两月，数数过往，可见相慕之深。

二、《云山日记》的流传情况

《云山日记》起至大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年十月三十日止，并元年十一月有闰月共十六个月，逐日记录，为天锡手书，装成四册。清初藏扬州程氏处，雍正三年（1725年）厉鹗录至大元年九月一日至二年二月五日，天锡客杭州的一段日记，并附客嘉兴的五条，回京口后的一条，合为一卷，名曰《客杭日记》，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中。乾隆三十年（1765年）安邑宋葆淳从扬州汪灏处易得全四册。灏歙县人，字石梁，号竹农，曾寄寓扬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冬宋葆淳录成副本。嘉庆五年（1800年）赵辑宁又从宋葆淳处借录赠鲍廷博，从此《云山日记》才有抄本流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归江南图书馆，有劳格丹铅精舍抄《云山日记》。陈庆年从丹铅精舍抄本移录，分为二卷刻入《横山草堂丛书》。陈庆年在刻书跋语中说：

“天锡真迹自芝山录副后，不知流传何所，……校录之余，想望原墨，余所引为深憾者也。”此跋作于民国八年（1919年），则此以前《云山日记》手迹尚不知流传何处。

建国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借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得《云山日记》真迹影印，仅存至大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年六月二十日，其中又缺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闰十一月初五日及至大元年闰十一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两处。除去残缺部分，尚存五十二页。影印本有翁方纲跋一则，绝句三首，为安邑宋葆淳题，时为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据此可知乾隆五十九年《云山日记》手迹尚藏宋葆淳处。影印本又有咸丰四年八月嘉禾周尔镛题识两则，则日记真迹于咸丰四年在周尔镛处。

据翁方纲跋，《云山日记》手迹当时尚存至大元年八月二十日迄至大二年十月三十日，装为四册，是尚为最初发现之本。而周尔镛题识，言日记止于至大二年六月二十日，较翁跋时已失去至大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三十日数十页。影印本所据底本即周尔镛藏本，其中又失去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迄闰十一月初五日，并至大元年闰十一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其中至大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至闰十一月初五日一段曾藏金镇处。据金镇题识，此段日记即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的《客杭日记》部分。金镇谓：

“原为宝瑞辰太史所收藏，后因其子析居，遂将此册拆开，经萧山朱氏用巨金得之，嗣伊需款孔亟，余又以一万二千金得之朱文钧手。”金镇所藏部分现藏首都博物馆。而另一部分起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初七日，和闰十一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两段，“文化大革命”前藏山西徐氏处，曾向上海图书馆求售，讨价甚高，未能成交，上图留一照片。十年动乱之后，此一部分日记又不知命运何如？此两部分合起来，尚缺至大元年闰十一月初六至初九，共四日，日记已非完整旧物。而至大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后数十页，至今尚不知流落何处？

三、《云山日记》所反映的元代

江南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社会状况

《云山日记》虽只记十六个月，但所记都是日常生活，对了解元代江南读书人的生活状况，很有价值。譬如当时读书人的选官，奔走请託，周折很多，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天锡于至大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杭州，二十二日即各处活动升迁事。二十二日有记：“打猪巷见李伯玉，留茶，话乃事，次到江浙省照磨所见李叔义。”二十三日记：“见李伯玉改所幹之文，约来日于省中见其子。”二十四日记：“早到省中照磨所见李叔义，改抹元文。”按元朝制度，行省设照磨，正八品，为文书的主管官，管理文书的承发及保管。天锡初到杭州经李伯玉介绍见李叔义，从这三天的日记上看，李叔义就是李伯玉的儿子，改抹元文即是修改天锡原写投递呈文。二十四日又记：“携李兄书见王一初都目投呈子，会王寿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该吏金君玉承行。”元代路吏请俸九十月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牒。都目是仅次于提控案牒一级的主管官，所以天锡升调事，见王一初都目的当天就落实儒学司吏金君玉承办。

元制江南书院委任山长，须行省札付都省，准拟，移咨施行。根据教官委任条例，须令按察司体复，都省准拟施行。所谓“体复”，意思就是复审，复审的范围，大约是勘验“解由”，“解由”是任满后上官给的评语和任内的劳绩。“解由”是升迁的依据，所以日记中有九月“二十五日德辉检寻解由未见。”

“二十七日到省中见张德辉，德辉约晚来说话，是日于省卷中检寻学录解由方见”等记载。九月三十日日记后附一条：“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礼房呈前镇江路儒学学录郭昇给由，禀奉省堂

钩旨：连送选房，于学正山长内任用者。”这大概是见到解由以后，附带看到江浙行省所给的批示，故附记于这一日。日记中尚有趣事一桩，至大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记：“是早张教礼任，往送之。赵资深诸公为欠俸米，阻押解由。”为了俸米未清，不给解由盖章，只有元朝官场中才有这种现象。此种给由人员尚须有勘合关防。元制，路、府、州、县任满求职人员，依例招知识保官，委省左右司官辨验无伪，重行结保，然后书填年月，半印，并须明白开写保官，于当月上报。“体复”大概包括这类内容。日记关于结保的事情也有多处记载：至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杨叔义、张青阳四哥来，求牒保充濂溪学吏”。“八月二十六日到学押保张仲方关子，转申总府”。

从日记上还可以看到读书人求职，除了一些公开应办的手续外，还必须有很多私人请托。天锡至大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到行省儒学提举司会王一初都目后，儒学司把他的升调事分付儒学司吏金君玉承办。当日有记：“约金君玉、毛令史市楼小酌。”二十五日记：“到提举司催金君玉书卷，王一初未允。再到省中见李叔义托见王公。”“二十六日辛巳好晨，集会礼房，见张德辉，德辉作书与王都目。”“九月二十九日吴若遗送鱼面果盘来，晚持鱼果见张德辉。”这些都是通过私人关系来进行他所需要办的事，这是元代谋事的一个具体写照，即在今天仍可看出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张德辉是当时江浙行省礼房吏，天锡在杭时常和他来往，是平江龚子敬介绍的。至大元年九月二十日有记：“早，子敬以八月二十八日礼上学道书院山长，作武临清提举书，张德辉外郎书，趁余入杭之便。”元时吏人都习惯称外郎，《通俗篇》卷五引《寓圃杂记》的话：“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之。”元代官府各衙门吏的权力很大，他们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天锡在杭时常与他们往来。日记上有很多这类事情的记载。至大元年十月二十二日记：“到省

中，马生以张郎中未允所请故为托辞。”“二十三日早，冒雾到马婆巷见李君实，托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张士瞻就是张郎中，天锡请人疏通也未达到目的，事情终因张士瞻的反对而未成功。二十七日记：“到省中，伺候书卷已完，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囑马生，不允。”“晚见马生，云：非不用力，首领官不从奈何。欲退原物，不曾收。”马生就是礼房吏马敬，字从斋，日记中也称他为马外郎、马公。元代官场习气很坏，遇事无论大小，悉奔走嘱托关节。日记中所说“欲退回原物，不曾收”，大概也是嘱托关节。

上面曾谈到元代为欠俸阻押“解由”的事，可见元代教官欠俸是很平常的事情。天锡于至大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离开杭州去长兴讨俸。他的父亲郭景星于至元末年出任淮海书院山长，后曾任长兴州儒学教授，天锡此次去长兴，大概是代他父亲讨俸。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早重雾，中见唐仲文不遇，为长兴欠俸事囑呈文催讨。”十一月二十二日记：“王二自镇江来。文卿俱饭，饭后携王二出见孟云心、陈素心、沈孤峰、陈继之，下大人书。”元时官场人情关系非常重要，就是讨俸也要通过人情关节，不然也会遇到困难。十一月初九日记：“文卿待早饭，饭罢，同出见沈孤峰，囑知州处说俸事。”十二日记：“见安亨甫，同出见刘元履，托语知州公为俸事。”十一月二十日记：“饭后见沈孤峰为俸事。”“复请沈孤峰同见吕舍人，囑与乃翁知州说俸事。”但具体支俸应在州学。元时路设教授二，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中上州设教授一员，教授主管州学事务。当时长兴州学教授为陈素心，十一月二十一日记：“访陈素心索俸。”闰十一月五日记：“文卿待早饭，饭已，同拉质夫到学中见陈教授，为索俸事。可否久之，开仓支米贰拾石六斗，欠四石，搬寄徐胜家。”天锡于十一月初四日离开杭州，到此时一月有余，始完成讨俸事。但闰十一月十一日又有记：“陈教者以呈

文白吕知州，拘收已还俸米，知州云，汝既亲自开仓与了，却教我作恶人，却之弗受。”“陈教来，赵文卿及余问及前事，大与宣争，却无语答。”此处可以看到元时官场的混乱，出尔反尔，直同儿戏。

从日记上看当时教官的例行事务，也只是每月初一、十五或节日到学中给孔子行礼，称为拜殿，又称为谒殿，谒殿时除有教官外，也有地方官下学。例须讲书，此种讲书多为虚应故事，讲书人并非真有学问，甚至鄙俚可笑。至大二年七月初一日记：

“早路学拜殿，郑鹏南金事、高唐刘总管新官下学，登堂听张教讲书，俨如北方道傍之小说者，斯文扫地一至于此，可胜叹哉！可胜叹哉！”九月初一日记：“早到路学，石侯拜殿，张教讲书，鄙俚之谈，不可闻，遂出。”此张教就是当时镇江儒学教授张仲举。

在日记中所看到的当时知识分子的私人日常生活，不外游览山水、吃酒、看画、写字以及收租等等。天锡是画家，日记中看画的记载特别多，而且多记对藏品的鉴别意见和收藏源流。至大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钦察宣差来，拉余过广福寺会陈素心。钦察同余至其家，仍约琦伯玉讲主看画。出唐本渡水僧，秦太师物也。观音二轴，小幅崔白芦雁。武后真，余皆下品。”十五日记：“访钦察公，同出闲步，回至其家，出宣和御府黄居采雪雀图，用双幅绢画。角上添金龙，长可六七寸，围葫芦御书并内府图书二印。雪树数株，冻雀上下，下复作二鸽鹊，真奇物也。钦察公凡三次招往看画，独以此为冠耳。又看破衣吕公像，陈尚书家物也。及小幅宣和飞禽，不敢断为真物。”所看的都是前朝故物，必追述其源流，而于宣和故物追述尤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元时江南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钦察是很小的地方官，时为长兴州同知，新授临安县达鲁花赤，而收藏如此之富，由此也可以看出，宋元更代之时，胜利者掠夺的痕迹。

元代读书人生活的来源还必须完全依靠地租，他们除了出来做官，求得一份官俸外，还必须依靠土地出租，收取租米。其实官俸也常常以租米的形式付给，在此十六个月的日记中，就有多处记载。至大元年九月初五日记：“金坛催仆蒋兴来，分付钮受二租。”闰十一月二十五日记：“佃户刘七二携豚蹄来见。”至大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记：“午抵金坛县，中坝上水急，舟三次上而复下，借人夫拽之乃上。学仆蒋兴辈来接。”四月三日记：“佃客刘七二、刘七三、经省五皆壮夫也，不半月皆病死，可伤。”这里讲的学仆、催仆，就是路学催租的仆人。至大二年十月十二日又记：“到路学寻萧君益，分付钮佃租事。”萧君益是镇江路学直学，这个钮受二就是承租路学租田的佃户。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元世祖至元间江南行省敛财急，官府将所在学田变卖，以钱输官。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有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九年正月诏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廩给师生及士之无告者。

在日记中还可看到时当知识分子与道僧往来的情形及宗教活动的兴衰。至大元年闰十一月初八日记：“文卿具早饭，见沈孤峰，会自云宗圆提点。”闰十一月十五日记：“晡时至湖州，舍舟由西门入城干事。晚宿东门外，有白云宗僧来趁船至平望，云是儒家子，亦可与语。”白云宗为佛教华严宗的一个支派，宋徽宗大观年间洛阳宝应寺僧人清觉所创立。此教派主张儒道释三教一致，重忠孝慈善，晨夕持诵，不事荤酒，躬耕自活。宣和三年后清觉居杭州白云庵，其教大行于江南，因被称为白云宗，教徒被称为白云菜。白云庵后改名为大普宁寺，元代大普宁寺主持道安曾主持雕印佛藏，现存元刻佛经，以普宁寺所刻者为多。

元代白云宗在江南一带有相当势力。日记中有段记游报国寺的事，也与白云宗有关。至大元年十月十八日天锡游大般若寺，般若寺在凤凰山的左侧，此地是南宋故宫旧址，南宋宫殿毁于宋端宗

景炎元年（1277年），元代于故址建般若寺、西番佛塔、万寿尊胜塔寺、大报国寺。日记记游报国寺曰：“次游新建报国寺，行至殿后有块石，仅留二十余字，僧别为立一牌云：‘五十年前理宗梦二老僧，曰后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梦觉，今筑地得此石，却无年代可考。昔梵刹为王宫，今兹复为梵刹，如波入海。’以予观之，亦好事者为之也，且朝代之废兴皆天也，二僧入君王梦中，孰记而传之耶？浮屠之说妄矣。”关于这件事在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安吉县朱实夫，马相碧梧之婿也。有温生者，因朱而登马相之门，近复无聊，遂依白云宗贤僧录者，无以媚之，乃创为一说云。曩闻碧梧与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谕云，朕尝梦一圣僧来谒，从朕借大内之地为卓锡之所，朕尝许之，是何祥也？马虽知为不祥，而不敢对。今白云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寝殿也，则知事皆前定。于是其徒遂以此说载之于寺碑以神其事。”两则记载的内容大体相同，可见这传说流传很广，《癸辛杂识》认为这段话是白云宗和尚编造出来的，并且“载之于寺碑以神其事”。天锡于报国寺所见残石，大概就是这寺碑的残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白云宗当时在江南影响是很广泛的。

《云山日记》是元代江南读书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写照，篇幅不多，也有它的局限，但确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失为了解元代江南社会的有用资料。这篇介绍所提到的仅是很小一部分，至于日记手迹的艺术价值，则完全没有谈到。

注：

①《云山日记》，横山草堂丛书本扉页作《元郭退思云山日记》，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作《郭天锡手书日记》，《古学汇刊》曾排印发行，底本系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赵辑宁抄本。作《元郭天锡手书日记真迹》。

②清吴荣光撰《历代名人年谱》载郭畀生于大德五年（1301），卒于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十五。俞剑华先生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从此说。但从元人俞希鲁所撰郭天锡《快雪斋文集》序上看，郭昇应卒于后至元元年，俞序作于至正十五年，序中曾言天锡之子郭启捧天锡遗文踵门而告曰：“此先君子遗文也，惟不幸弃诸孤，时启方孩提，未有知，今二十余年矣。”从至正十五年上溯至后至元元年，正是二十一年。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

宋代科学家苏颂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科技史学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等单位发起，厦门市同安县政府主办的“纪念苏颂创建水运仪象台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11月在厦门市同安县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加拿大、港澳地区及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海外侨胞及苏氏宗亲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苏颂在天文学、药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他在政治、外交、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如以前学术界对苏颂的里籍、政治态度，及其天文学著作《新仪象法要》的成书时间等问题素有分歧，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有些学者还对苏颂在机械图纸、星图绘制及编纂《本草图经》等方面的成就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有的学者提出，苏颂主编的《本草图经》是本草学著作由单纯药理学著作扩展为博物学著作的标志，为本草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次会议还促进了苏颂遗著的整理与出版。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校点了《苏魏公文集》（附《魏公谈训》），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杨荣珉、管成学注释了苏颂的天文学著作《新仪象法要》；蔡景峰等对《本草图经》佚文进行了搜集整理；颜中其、管成学还编写了《苏颂年谱》。

• 其 学 •